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 著
蕭滌非 鄭慶篤 整理

皮子文藪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皮子文藪/(唐)皮日休著;蕭滌非,鄭慶篤整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7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505-2

I. ①皮… II. ①皮… ②蕭… ③鄭… III. ①唐詩—詩集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晚唐 IV.
①I214.2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153224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 著

蕭滌非 鄭慶篤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常熟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0.125 插頁 6 字數 170,000

1982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2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700

ISBN 978-7-5325-8505-2

I·3181 (平)定價: 3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皮日休文集卷第一

文數

賦

霍山賦

憂賦

河橋賦

飛花賦

霍山賦 并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主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強以頌以文李上發輔軒使得持以開六年主壽之駢已曰霍山故岳也邑贊于趾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平巖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龜手乎驛心乎聳神乎竒始欲狂其文需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法然得敵躁然憾因紛然焚然悅然墮空浩然渾渾然久矣則知才智之劣如老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開其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既浹其

精忽淪怙然而勝躁然而通紛然而靜悅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其詞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清爲山峻清爲岳其山厥臣其岳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岳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勃勢剝豫華嵩青折交低如垣而秀如塊而銳岳之高千仞萬仞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岳之尊端然御極儼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早其儀若肅其臣岳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靑滿天岳之靈其神不眠其報如響若雨用澤岳能霽之若歲用旱岳能澤之岳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臨染升華蔓達迷濛縉數百里岳之形有雲霧縉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攫地其

唐皮日休文藪序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柳開撰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陽膠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

新版說明

皮日休是晚唐時期一位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文藪十卷是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對後世影響較大。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於一九五九年曾印行了蕭滌非的一個校本。這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委託我們在校本的基礎上，重加校勘，並予新式標點，作為一個定本出版。這無疑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關於這個重校標點本有如下說明：

關於校勘：文藪刻本，傳世較多。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校本，是以四部叢刊影印本（簡稱叢刊本）為底本，又依盧氏據明仿宋本（簡稱盧本）、明刊殘本（缺首頁及次頁之半，簡稱明本）、鄒城于氏影宋本（光緒八年刻，簡稱于本），以及有關載有皮氏詩文的選本或總集（其中全唐文、全唐詩俱簡稱全本，分別與文、詩對應）作了互校。而這次的重校，是把上次的校勘成果直接納入正文，成為定本，除須兩存者或難以判定者仍保留校記外，其餘均略。同時，這次的重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配合協助下，從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先後得到四庫

全書本（簡稱四庫本）、明公文紙本、明許自昌校刊本（簡稱許本）和合肥李氏重刊宋本（光緒二十一年刻）的複製本或過錄本。我們更從山東大學圖書館查得國內罕見的日本享和二年（公元一八〇二年）刊本（簡稱享和本）。這樣，見於著錄的皮子文藪版本，可說幾無遺漏了。這些本子與前次所用版本，字句頗多異同。特別是享和二年本和四庫全書本有多處優於他本者，使原先的一些存疑或阻梗，得以迎刃而解，誠屬快事。這次重校，擇善而從，逕改正文，並作出校語，仍附於每篇之末。

關於標點：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校本只作了斷句，用了頓號、句號兩種。這次改用新式標點，並加用專名綫，以便讀者。

關於附錄：文藪是皮日休的自編集，其中文九卷，詩僅一卷，並不是作者的全部作品。爲方便研究者知人論世，全面了解皮日休，這次把文藪以外的詩文，也作了標點，作爲附錄，附於文藪之後。全唐詩載其詩九卷，全唐文載其文四卷，除文藪已收錄者外，仍依全唐詩、全唐文原次編排。詩據全唐詩康熙四十六年刻本，並以明毛晉刻本松陵集作了一些校勘。文據全唐文嘉慶十九年刻本，參照了唐文粹中的有關篇目。必要的地方也作出了校語。附錄中還有各種版本的序跋。

最後，爲便於讀者對皮日休及其作品有個大致的了解，這次把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藪的前言，也附於書後。

皮日休的思想比較複雜，文筆亦時有晦澀。由於我們水平所限，校勘標點難免有誤，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蕭滌非 鄭慶篤

一九八〇年七月於山東大學

編按：今重新排印皮子文藪，稍作修訂，並將原一九五九年版前言移至此新版說明後。謹此紀念本書始作者蕭滌非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誕辰。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藪前言

一
皮子文藪十卷，是晚唐現實主義詩人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一至九卷是各種散文，第十卷是詩歌。

關於書的命名和編輯經過，作者在文藪序中曾作如下說明：「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壽州）東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咸通丙戌，是唐懿宗咸通七年（公元八六六年），也就是黃巢大起義的前十年。

我們知道，唐代最重進士之科，但當時考試還沒有糊名的辦法（試卷糊名始於宋真宗），一個人及第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的平素文名。爲了取得公卿們的吹噓，當時舉子們通常是在考試之先將平日所作詩文編成卷子分頭投獻，叫作「行卷」。假如落第，那麼第二年就再獻，叫作「溫卷」。自序說「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可見就是「行卷」、「溫卷」一類的東西。

「行卷」，一般的說，是不會有多高價值的。但對皮子文藪我們却不能不另眼看待。這是因為作者並不曾爲了博取大人先生們的喝彩，故意寫些春風滿面的文章，而是堅持着自詩經以來便已形成的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他的創作動機，正如他在自序中說的，是要「上剝遠非，下補近失」。他認爲：「詩之美也，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正樂府序）所以他力求做到「句句考事實，篇篇窮玄虛」（奉酬崔璐見寄），而「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桃花賦序）。這種文藝觀點，和白居易的「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正是一脈相傳。因此，儘管這是一種「行卷」，但作者仍能相當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那個即將到來的農民大起義前夕的社會現實。

魯迅先生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曾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文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諷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爲隱士，別人也稱之爲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裏的光彩和鋒鏑。」從這段極其概括的話中，也就可看出皮子文藪的價值和它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了。

的確，在皮子文藪中是有着不少的鋒鏑畢露的尖銳諷刺的。比如他說：「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爲盜。」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爲己累，故己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爲天下累，故人憂之。「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均見鹿門隱書）所有這些託古諷今的話，都可以說是

一鞭一條痕，一抓一掌血的。他還說：「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害己；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這番話也很深刻，能發人深省，具有唯物主義的觀點。

不僅如此，對整個封建時代一貫推崇的所謂開國之君的本來面目，他也作了大膽的揭露。他說：「古之取天下也，以民心；今之取天下也，以民命。唐虞尚仁，天下之民，從而帝之，不曰取天下以民心者乎？漢魏尚權，驅赤子於白刃之下，爭寸土於百戰之內，由士爲諸侯，由諸侯爲天子，非兵不能威，非戰不能服，不曰取天下以民命者乎？」（讀司馬法）原來所謂創業垂統的聖帝明王，從皮日休看來，都不過是屠殺人民的最大的劊子手而已。正因爲如此，所以他沒有把皇帝當作神聖不可侵犯的偶像來崇拜，而是認爲：如果皇帝不好，老百姓即使把他掐死甚至滅族，也不算過分。原謗篇說：「嗚呼，堯舜大聖也，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爲堯舜之行，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逐之，折而族之，不爲甚矣。」這種民主思想，雖受到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的啓發，但更爲大胆而徹底。孟子還是多少爲周武王辯解，而皮日休則是完全替人民講話的。這正是後來作者參加黃巢起義軍的思想基礎；而黃巢起義的徵兆，也於此可見，因爲這種思想乃是當時階級鬥爭尖銳化、表面化的反映。

據北夢瑣言卷二，皮日休是咸通八年，即編定文藪的第二年「榜末及第」的。這不能不令人奇怪：讒書的作者羅隱「十上不第」，所以羅袞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名休」，徐夤贈詩也說「讒書

編就薄徒憎」，可見羅隱正吃了讒書的虧。那麼爲什麼皮日休却能憑文藪而一舉成名呢？我最初頗不解，後見南部新書卷丙載：「大中（宣宗年號，公元八四七至八五九）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三二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謂曰榜花。」這才恍然大悟，皮日休之得以榜末掛名，在很大程度上叨光了他的尊姓。不成問題，作爲統治階級用來僞裝公道以平衆憤的一個點綴品，所謂「榜花」，姓皮的要算是最有資格的了。皮日休及第後，並不得意，過了幾年才弄到一個太常博士，所以他曾憤慨的說：「季氏唯謀逐，臧倉只擬讒。」（江南書情二十韻）這才是權貴和宦官們對他的真正的態度和對文藪真正的「評價」。

像這樣一部光輝的創作，我們花點工夫加以校勘和必要的斷句，是完全應該的。

二

皮子文藪十卷，從最初編定時起，在文壇上便享有很高的聲譽。陸龜蒙和皮日休詩說：「近者韓文公，首爲開闢鋤。夫子又繼起，陰霾終廓如。搜得萬古遺，裁成十編書。」所謂十編書，即指文藪十卷。龜蒙此詩作於咸通十年或十一年，距編定時不過三四年。由此可以推知，文藪一書，當時傳抄，必很普遍，所以北宋初姚鉉編唐文粹得以大量採錄，後來新唐書的藝文志、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也一直有著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文藪的刻本，個人所見有以下幾種：四部叢刊影印袁氏明刊本、盧氏據明仿宋本（見湖北先正遺書）、明刊殘本（缺首頁柳開序及次頁文藪序之半）、于氏影宋本（光緒八年刻）、全唐文

本。這裏，是以四部叢刊影印本爲底本，而與其他各本互校，並參考一些載有皮文的選本，如唐文粹、涵芬樓古今文鈔等；詩的部分則主要是用全唐詩，並校以最近影印的宋刊樂府詩集。共計校出脫文、誤文、衍文、倒文等五百餘條，雖不敢云盡善，基本上是可讀了。

在校勘中，也會碰到這種情況：明知某字必誤，但各本都無異文，如通玄子栖賓亭記，篇末明載「五年（咸通）五月朔日記」，但篇首却有「五年冬」的話，這個「五」字顯然是錯誤的，但各本都作「五」。在這種情況下，我有時只是指出某字有誤，有時也提出意見，如某疑當作某之類，不徑改原文。只有當文中所引與原書不符時，則即使各本均同，也予以校改。例如無項託篇：「嗚呼，項氏之有無，亦如乎莊周稱盜跖、漁父也，墨子之稱墨尿、娟嬋也。」按列子力命篇云：「墨尿、單至、嚙咍、慙慙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尿音賦。方言：『小兒多詐而獯，謂之嚙尿。』把列子錯成墨子，這很可能是由於皮日休的一時誤憶，只要指出就行，不必去改；但「尿」當作「尿」、「娟嬋」當作「嚙咍」，則是可據原書而予以改定的。又如憂賦篇：「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鄭卿構基。」這兩句是說宦官專權的。「中令」指石顯，顯在西漢元帝時爲中書令（見漢書卷九十三佞幸傳）。「鄭卿」應作「鄭鄉」，指鄭衆。東漢時和帝封鄭衆爲鄭鄉侯，食邑千五百戶（見後漢書卷一百八宦者傳）。但各本「鄉」都作「卿」，顯由二字形近而誤，也是可據原書改正的。

關於「點」的方面，這裏只用了逗號和句號兩種，但點起來也頗不簡單。唐語林卷二說：

「元和（憲宗）已後文章：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皮日休最推崇韓愈的散文，如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說「文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並推爲「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所以他的文章也是學韓愈的（陸龜蒙說他是韓的繼承人，並非瞎捧）。不僅有韓愈的「奇」，還帶點樊宗師的「澀」，因而不大好點。

文藪所收文章，據自序，應該都是咸通七年以前寫的。但河橋賦序却有「咸通癸巳歲，日休游河橋」，「著河橋賦」的話。癸巳是咸通十四年，顯與自序矛盾。繆鉞先生疑「癸巳」爲「癸未」之訛（四川大學學報二期：皮日休的事迹思想及其作品）。按癸未是咸通四年，這年春，日休已由襄陽南下郢州（湖北鍾祥），一路往東南走去，這年秋，他到了南京（見白門表），而咎繇碑又有「五年春，日休自淝陵（安徽壽縣）之江左」的話，可見，在咸通四年他不可能又北上洛陽。

按全唐詩有皮日休洛中寒食七律兩首，第一首末云：「唯有路傍無意者，獻書未納問淮肥。」肥即淝陵，亦即書序所謂「州東別墅」的「壽州」。可見，皮日休咸通七年落第後，曾由長安取道洛陽到安徽去。又第二首云：「遠近垂楊映鈿車，天津橋影壓神霞。」可見他在洛陽曾游河橋（河橋賦所賦的橋即天津橋）。因此，我認爲河橋賦和洛中寒食二詩當是同時之作，都作於咸通丙戌（七年），「癸巳」可能是「丙戌」之誤。「丙」字壞其兩邊，更易誤猜作「癸」字。這個錯誤，大概在最初的傳抄階段便已有了，因爲現在各本都作「癸巳」。總之這篇賦決不會是咸通十四年作的，因爲早在咸通七年所作的書序，已有「慮民道艱難，作河橋賦」的話。

還有一種情況可以作爲旁證，那就是唐人雖愛詩如命，對於賦却不感興趣，只是爲了考進士不得不學這一手。一旦成名，他們便把它丟到九霄雲外，再不爲它絞腦汁，連大詩人杜甫、白居易都不例外。皮日休也是這樣。他一共寫了四篇賦，河橋賦外，霍山賦、憂賦、桃花賦都是及第前寫的，及第後，他便專意寫詩了。所以即從當時寫作風氣來看，河橋賦作於咸通十四年（即及第後六年）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三

現在，要談一談有關文藪的作者皮日休的一些問題。

日休先字逸少，後改襲美，湖北襄陽人，居鹿門山。他曾給自己起了一連串的外號，什麼「閒氣布衣」、「醉吟先生」、「鹿門子」、「醉民」、「醉士」等等。

他的主要活動時期是咸通至廣明的二十年間。這是怎樣的一個時代呢？我們且看韋莊的咸通詩：「咸通時代物情奢，歡殺金張許史家。破產競留天上樂，鑄山爭買洞中花。諸郎宴罷銀燈合，仙子遊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華。」陸龜蒙的村夜詩更概括：「萬戶膏血窮，一筵歌舞價。」貫休的東陽罹亂後懷王慥使君詩也說：「無人與奏吾皇道；致亂唯因酷吏來。剝生靈爲事業，巧通豪僭作梯媒。」原來當時統治階級的生活是那樣的糜爛腐朽，而他們的壓迫和剝削也竟然到了以「剝生靈爲事業」的地步。這就是皮日休生活於其中的時代環境，也就是文藪創作的社會基礎。（應該指出：這個「剝生靈」的「事業」，乃是最高統治

者和他的爪牙們所幹的共同事業，貫休把酷吏和皇帝分開，好像和皇帝無關，則是不對的。）

皮日休的出身是個道地的「寒門」，够得上說是個「農家子」。他自言：「至於吾唐，汨汨於民間，無能以文取位……自唐以來，或農竟陵，或隱鹿門，皆不拘（一作抱）冠冕，以至皮子。」（皮子世錄）而據答陸龜蒙詩：「老牛瞪不行，力弱誰能鞭！」可見他少年時還確實有過一段勞動生活。

文藝是社會現實的反映，但不接觸現實也就不可能反映現實。皮日休所以能够成爲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和他的勞動生活以及那種「對燈任髻熱，憑案從肘研」的苦學精神固然有關，但廣泛的深入社會生活更是一個重要條件。他在太湖詩序中曾說到自己的行踪：「南浮至二別，涉洞庭，迴觀敷淺原，登廬阜，濟九江，由天柱抵霍嶽，又自箕潁轉樊鄧，陟商顏，入藍關，凡自江漢至於京，干者十數侯，繞者二萬里。」（全唐詩皮日休詩卷三）這種廣泛的閱歷，無疑對他的創作和後來終於參加農民起義都有很大關係。文藪中有不少好作品便是在「繞者二萬里」的過程中寫成的。

但是，作爲曾經參加農民起義這樣一個在文學史上絕無僅有的作家，皮日休也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問題。這裏我想簡要的談談以下三點：

第一是生年問題。聞一多先生的唐詩大系（聞一多全集第四冊），定皮日休的生年爲公元八三三年，現在一般文學史也都定在這一年，但可惜他沒有提出證據。按唐文粹卷五十一所載

皮日休的文中子碑有這樣一句：「後先生二百五十歲生日皮子。」文中子是王通，生於隋文帝開皇四年（公元五八四年），從公元五八四到八三三年，恰是二百五十年，這可能就是聞先生的根據。但是，這句話是有問題的，因為各本皮子文藪都作「二百五十餘年」。而且，即使照二百五十年算，但既是「後」，那也應該是公元八三四年。我以為皮日休當生於公元八三四至八三八年的幾年間。好在這問題關係不大，可不贅。

第二是為黃巢翰林學士問題。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因為關涉到皮日休的政治立場、政治態度。首先要指出的是，皮日休並不是自動的投効黃巢的。唐詩紀事卷六十四說日休「遭亂歸吳中（蘇州），黃巢寇浙江，劫以從軍」。郡齋讀書志卷四也說日休「為毗陵（江蘇武進）副使，陷巢賊中」。地點雖不同，但都說是被劫，這大概是可信的。黃巢曾兩度入江浙，一在公元八七八年（見新唐書僖宗紀），一在公元八七九年（見通鑑卷二五三），被劫從軍，究在何年，則尚難斷定。

皮日休雖是被劫從軍，但從黃巢一入長安使用他做翰林學士而他並沒有拒絕這件事看來，顯然他是傾向於革命的。假如他也像詩人周朴那樣封建頑固，把黃巢看成「賊」，說什麼「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唐詩紀事卷七十一）那他就不可能接受黃巢的任命。由於當時大部分失意文人對唐政府的怨恨，在社會上形成一股有可能和革命結合的力量，黃巢當時採取了優待儒者的所謂「下士」的政策來爭取他們，保護他們的生命財產，甚至有的被俘的人，只要冒充一